

追寻抗战往事

崇明检察院出手抢救『被遗忘的』红色资源

危房仓库原是『伏击日军遗址』



■ 针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不可移动文物申报工作已经启动,遗址周边环境也得到有效整治 采访对象供图

今年2月,崇明区检察院的数字公益检察系统突然弹出一条不寻常的线索。检察官们注意到,辖区某乡镇一处被列为重点红色资源——“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在卫星图上呈现出一片混乱的“五彩斑斓”:有的地方成了草地,有的用途模糊不清。这处承载着血与火记忆的地方,似乎正在地图上悄然“消失”。

列为重点遗址

时间拉回到1939年,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边抗”四大队)的90多名战士在崇明西部的一处村庄积极宣传抗日,英勇打击日寇,并吸收当地热血青年入伍。同年9月30日拂晓,因奸奸告密出卖,日伪军突袭“边抗”四大队,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激战中,中队长钱国仪跃上房顶,用机枪猛烈扫射,拼死阻击,最终胜利突出重围,而他却和多名战士英勇牺牲。这段悲壮的历史因此也被记录在《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的通知中,“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被列为重点遗址。

获悉线索后,崇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部门检察官即刻动身前往遗址核查情况,然而没想到的是,就连寻找到此处旧址都费了一番功夫。在尝试使用地图软件无法搜索到“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后,办案人员了解到,该处遗址位于某乡镇新安村503号,于是决定先前往该村村委会了解情况。到达村委会后,村支书、工作人员均表示对这个地方比较陌生,检察官只好向熟悉周边情况的老村民寻求帮助。

“那附近房子一直没有修,早都成危房了!”办案人员在与老村民的交谈中了解到,“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所在地周边的房屋均为农村私宅,新安村503号的房屋也已经转让给某企业作为仓库使用。

办案人员来到新安村503号,眼前的“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破旧不堪,周边的房屋房顶已经破损,屋内堆满杂物,屋外满是杂草,丝毫看不出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英勇抗争的伏击战。

“不能让曾经流淌过鲜血的抗战记忆被人遗忘。”这个信念不断敲击办案人员的内心。此后,他们迅速梳理了相关案件事实、法律关系和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将“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等红色资源保护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受理,并向属地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对相关红色资源采取保护措施,并督促加强辖区内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避免类似情形发生。

唤醒红色记忆

属地镇政府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第一时间和办案人员取得了联系,共同研商整改方案。崇明区检察院一方面协调区文旅部门指导镇政府对遗址进行不可移动文物申报,另一方面详细咨询专家学者意见,研讨传承和保护的有效路径,帮助镇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

近日记者了解到,目前,针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不可移动文物申报工作已经启动,遗址周边环境也得到有效整治。属地镇政府在线上线下同步宣传遗址的红色故事,将红色点位和阵地串点成线,开发红色旅游,打造文化名片。这段沉睡的红色记忆被再次唤醒,革命先烈英勇抗争的事迹将再次展现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汪杰 王斯怡



■ 饶家驹(左三)坐在一辆法国警察开的摩托车的侧车里,在安全区四处奔走 采访对象供图

这是一段尘封已久却影响世界的往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博爱、睿智、奉献的法国人。他在日军的炮火和难民的哭喊中,设立了南市安全区,庇护了30万上海难民。这样的义举堪称传奇,然而今天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新书重现历史

昨天下午,上海展览中心东二馆内,“抗战中伟大的人道主义典范——饶家驹与上海南市安全区”报告会暨《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新书签售会,将88年前法国人饶家驹在日军的炮火和难民的哭喊中创设安全区拯救30万难民的壮举,以学术研讨、新书发布的形式重现于公众视野。

《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作者,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苏智良教授,向观众讲述了这位“难民之父”的壮举。这本著作依托大量第一手档案、书信、照片及口述史料,首次系统梳理了饶家驹在上海创立与运作南市安全区的全过程。

八一三战役,难民百万。当时,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由军警驻守,大量难民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绝境。1937年11月2日,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让南市没有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与军事设施,因而也不受日本军事攻击。11月3日,俞鸿钧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书上签字。“这么一个安全区,中国人和日本人没有坐下来开过一次会,完全是靠他在奔走,在穿针引线。”苏智良告诉记者。

1937年11月9日下午5时,南市难民安全区在旧城厢北部成立。该区域占旧城厢三分之一的面积,约1平方公里。安全区四周飘扬着特殊旗帜:白底旗帜上绘有红色圆圈,内套红十字,并缀有中英文“国际救济会”字样。据《申报》记载,该安全区最高峰时曾容纳20万余难民,成为他们的生命庇护所。

饶家驹凭借娴熟的外交技巧,依托上海法租界房檐下的庇护,并借助国际媒体的关注,使得上海南市安全区始终未发生日军杀戮事件。在安全区存续的963天里,他多次挺身而出,坚决捍

卫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与难民生命安全。此外,饶家驹还与法租界沟通解决了安全区的供水供电问题。据当时报纸记载,安全区“计每日分两次发给干粮,第一次在上午9时,第二次在下午2时,足资难民果腹”。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5月26日,饶家驹面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罗斯福明确表示其开展救助事业时,可自由使用美国总统名义,并当场慷慨捐助70万美元。

寻找难民后代

“饶家驹是中法友谊的象征,他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战争与危机中,人性之光永不熄灭”,苏智良告诉记者,饶家驹的壮举促成《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平民保护条款的制定,他书写的不仅是中国抗战史,更是人类文明史。现场,苏智良教授与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徐波,联合向上海市民发出寻找饶家驹安全区30万难民后人的倡议。希望他们分享其祖辈、父辈战时在难民安全区的所见所闻,再现当年的故事。此次寻找30万难民后代的倡议将从2025年8月13日持续到2027年8月13日。

本报记者 曹博文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闭馆改造后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昨天起重新向社会公众开放,展馆内举行的“血沃淞沪——淞沪战役主题展”“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上海抗战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市民观众前来观展。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新民随笔

“开车看手机”的两个误区

纪玉

近日,上海公安交警部门曝光9起交通违法案例,其中5车涉及“驾车时浏览电子设备妨碍安全行车”违法行为,受到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抓拍画面显示,驾驶员边开车边拿着手机浏览。

开车时浏览手机等电子设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注意力分散,影响对道路交通状况的及时判断,对车辆的操控也会减弱,遇到突发情况往往措手不及。今年6、7月间,

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驾车时使用手机、分心驾驶导致的多人伤亡事故。一个“小动作”中隐藏的极大安全隐患,值得更多驾驶员牢记于心、保持警惕。警方也多次提醒,驾车时不接打手持电话、不浏览电子设备、不整理个人物品。有人可能陷入这样的误区:开

车看手机确实不利于安全,那我开慢一点行不行?现实中,“龟速车”背后,往往就存在开车浏览电子设备等行为。与“越慢越安全”的错误认知相反,“龟速车”不仅影响道路通行效率,有时成为拥堵源头,还容易引发追尾、刮蹭等事故。当下,包括上海在内的多地交管部门,已对

“龟速车”展开治理,开车浏览电子设备等违法行为,在无人机的抓拍取证之下将暴露无遗。

还有一种误区:我开着辅助驾驶,看会儿手机没问题吧?然而,至少在现阶段,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盲信辅助驾驶酿成事故的案例并不少见。今年6月,有车辆在

高速公路上爆胎,虽然车上人员很快下车转移,但驾驶员忘拉手刹,导致溜车。不久,另一辆车撞上爆胎车辆,事发时驾驶员开着辅助驾驶,本人则低头看手机,等发现前方有车已避让不及,最终因分心驾驶被认定负次要责任。

坐在驾驶位上意味着肩负重大责任,开车就要集中注意力,杜绝分心行为和侥幸心理。“开车不看手机”应深入人心,知行合一。